

关于当今社会变迁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吴大声 印 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明显加快了变化速度。时至今日，这场变革已迅速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组织乃至每一个人，变革的领域已远远地超出了经济范畴。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一些熟悉的东西正在匆匆离去，而一些陌生的东西，却已进入了人们生活之中。五年多来，社会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三十年，原有的社会结构在这种加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已开始变形。从总体上把握“变形”的程度、性质及趋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至少在直观层次上，面临目不暇接的变化，在生活、工作、心理、观念等许多方面所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已经迫使人们认识到进行选择的必要。后退显然是毫无出路的，但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又不能不立足于对现实的思考上。我们认为，描绘社会变迁的未来，固然重要。也能引人入胜。但在当前，更有必要的是对当今社会变迁的速度和顺序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三条影响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主脉络

我们所说的社会变迁是社会体制的变迁。目前，这种变迁将不以缓慢的演进为满足。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决定，都已正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党的方针。但是，任何事情从决策到实施，到获得预期的结果，都不是一个毫不费劲、唾手可得的必然过程，需要进行大量协调、组织、控制等工作。决策的正确并不必然意味着预期结果的获得和成功。

当前我国以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当然也是如此。例如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在城市的全面展开），由于我们缺少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的功能、传统文化的功能、心理惰性与惯性等）的深入研究，所以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否则，稍有不当，就很可能造成重大失误。从这种意义上看，可以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在何时、何处、何种层次上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其互相促进，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许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无懈可击、论证充分的措施，实际执行起来很可能困难重重。例如严重阻碍经济改革发展的不正之风，就常常打着“改革”的幌子畅通无阻；投资“饥饿症”和消费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经济因素在起决定作用；改革价格体系，如果措施不当，在经济上所得到的利益，很可能被物价上涨所产生的消极因素所抵消；在目前来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很不错的行为，从长远来看很可能造成重大损失。这些都说明我们必须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自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也正

因为如此，我们对社会变迁的方向、顺序、速度等方面必须予以周密的思考。越是表现为变化激烈的变迁，就越应该慎重对待。

在研究社会变迁时，我们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中抽出某些主脉络，借此来分析各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通过控制主脉络的发展趋向把握变迁进程。那么，伴随着改革的发展，当今社会究竟有哪些方面应该引起我们密切的关注？概括来看，可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两个开放的迅速展开；第二，农村工业的蓬勃兴起；第三，追求自由的进程。

这就是当今社会已经出现而又发展迅速，并且必将对我国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大主线。从这三大主线的发展过程来看，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过去一直受到巨大的压抑。

尽管这三条主线各自都有其深厚的基础和根源，但它们运动的领域却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再加上由其派生或繁衍出来的许多变化——好的、坏的、一时难以判断是好是坏的，就使得人们在考察社会变迁的轨迹时，不能不对各种因果关系的分析、判断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我们认为，把握住这三条主线脉络的生成、分化和发展趋势，对于当今社会变迁的认识和未来演变的估计及控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两个扇面与社会变迁顺序的选择

回顾我国近几年对外开放的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围绕东部沿海地带，开放是呈点——四个经济特区；线——十四个港口城市；面——三个三角洲，分层次逐渐展开的格局。

有两点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相对来说是我国比较富庶的地区，经济、技术实力历来比西部地区雄厚。这意味着整个宏观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的状态，有可能变得更为突出；第二，由于“点”、“线”与“面”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迭在一起的（即四个特区和十四个开放城市大都在三个三角洲开发区内），对经济开放区区域内部如何重新协调城乡关系、如何重新调整城市的功能等都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从指导思想上看，与对外开放并行不悖的对内开放，也正是基于这两点而提出来的。也就是希望通过更广阔的对内开放，来协调东西关系与城乡关系，以求得整体上的共同发展。在此意义上的“两个开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意味着以沿海地带为枢纽，展开两个扇面，实现经济实力的梯度转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意味着文化的大规模传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巨大的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闭关锁国达三十年的我国来说，更是这样。

但是，一个合理目标的实现，不但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更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手段。我们认为在总体上如何建立对各种不平衡状态的补偿机制、在各个部分如何选择开放的内容、确定开放程度及其先后顺序，对于保证整个结构的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关系重大。

无需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两个开放的态势必然会形成各种经济、社会的结构的不平衡状态。比如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所有制方面，沿海地带将出现一批“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仅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到1984年9月，这类企业已达1,656个。利用外资达18亿美元。另外尚有近40亿美元的项目待批。随着进一步开放，沿海地带这一类“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从而使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某种变化。对所有制结构的冲击，还有来自个体经济方面。据统计，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个体户一千六百余万，营业额达三百多亿元（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来自税务部门的营业额的统计是偏低的）。在生产结构方面，

由于沿海地带外资的投入和国内为利用这种投入而进行的各种配套，无论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是技术结构，都会形成东西部的新的巨大的不平衡，原来就比较发达的东部经济将比西部更为发达。当然，在其它构成经济结构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智力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都会由此而造成各种各样的不平衡状态。

从社会结构上看，外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规模传播，正在剧烈地改变着中国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个人的心理还是社会组织的内部，为了适应这种冲击，不得不抛弃一些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老观念，但新东西却又一时难以与传统的东西融和。类似的种种矛盾，使原有社会结构的平衡产生了危机。这里仅以电视的发展为例，补充说明上述观点。

我国城市电视机的普及进程始于七十年代末。短短几年，城市已基本普及（在江苏，1984年底每百户职工拥有电视机已达88台）。如此迅速地普及了电视机，与我国的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电视机作为一种商品有其独特的一面，其使用价值的实现不仅仅是其自然属性的满足，还需作为精神产品的物质承担者。它在打破我们原有的大众传播媒介结构的同时，也就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生活结构。

我们在南京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占平均拥有闲暇时间的59.1%；在闲暇时间的消费上，认为第一位是“看电视”的达65.7%；观众收视率最高和最喜爱的五部电视剧，都不是国产电视剧；所有数据比较一致地证明，凡是涉及外来文化比较多的节目，收视率普遍较高。

这一切，本来不足以使人感到稀罕。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不平衡倾向予以恰当的补偿，适当的控制，普及化的电视在向观众生动地介绍其他各种生活方式和理想时，尽管并不都是有意的，将可能产生与我们的愿望和目的相反的结果。

类似电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我们在调整三十多年来所形成的不平衡的结构时，如果缺少对处于运动状态中的不平衡作出有力补偿，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其辕而北其辙。

应当指出，在开放过程中，面临大规模的文化传播，即使外来的文化内容都是精华，毫无糟粕，是不是就都能与我们这个民族完全融合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首先立足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予以改造、更新，产生富有时代特征的本民族的新文化，我们就不能实现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只会形成杂烩一锅。更有甚者，甚至会如一个病夫，在没有消化能力的情况下，大嚼海参鱼翅，反造成病情恶化一样。没有富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文化作支柱，社会变迁的结果是难以乐观的。因此这里就存在着必须对顺序进行选择的问题。

同样，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补偿，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也存在顺序选择问题。例如，作为长期国策，开发西部是必然的。但从短期乃至中期来看，国家的资金有限，投向哪里，怎么投，都必然慎重选择。随着开放，东部与西部的不平衡怎么协调，也需要选择：是把东部的资金、技术分散流到西部各地；还是西部人口适当集中并转移一部人到东部水资源丰富地区？在开放区域的内部，城市的功能无可置疑地向金融、信息、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主的方向转换，工业也必须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那么东部城市原有的生产能力所让出来的一部分市场，是由西部的城市来承担，还是进一步大大发展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东部城市随着经济的发达、企业微观层次的活跃，必须要求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那么这种流动是有计划地进行还是自由地通过市场来交流？在这里，不同的选择对于社会结构的平衡条

件显然是不同的。

总之，由于开放，客观上会存在各种不平衡状态。从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影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补偿或控制这些不平衡状态，使开放有力地促进社会变迁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也必然能够有力地保证进一步的开放。

三、农村工业化与社会变迁的辩证关系

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我国三十多年来扭曲的生产结构就是如此。

建国初期，由于原有基础的薄弱和国际环境的压迫，必须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于是，国家只能通过扭曲生产结构，再扭曲价格体系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强制平衡。主要表现在通过“剪刀差”这种“暗拿”方式，从农民手中实现工业积累。

这些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造成结构性失业，而农村更是首当其冲。由于工业品的价格在社会平均价值之上，农村经济政策一旦放开，无法进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稍有条件，立刻涌向农村工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镇办、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不管什么形式，也不管什么内容，只要能增加收入，农民就要办。

如何估价广大农民办工业，是一个既关系到今天更关系到明天的复杂问题。可以肯定，农民办工业对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好的或坏的）都将是深远的。不能不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忽视和回避都是不现实的。

首先从经济行为上看。农村工业已是比较完全的一支市场经济力量。在我国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允许这支力量强大到何种程度，允许这支力量在那些领域、那些层次上发挥作用，必须作出选择。由于农村工业与农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它们承担着许多原来国家应该承担而暂时又没有能力承担的义务。许多事看来是在微观调节上起作用，事实上却成了国家宏观调节的组成部分。因此，在选择对它们控制到何种程度时，国家就必须补偿由于这种控制而使它们无能力承担的那部分义务。

其次从思想观念上看。所谓“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农村经济实力向城市的推进，而是农民们在农村坚定改革的决心，以及由于他们在行动上的成功所演绎出来的一些观念。这样一种气氛，对曾经同样处于僵化状态的城市既有一些新鲜感，同时也有相当的压力。当然还有来自城乡经济活动必须具有连续性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农村的经济基础与城市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且从改革的初始目标来看也是截然不同的。农村是从生活极为困难等一些最基本的实际问题出发，向温饱进军，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才涉及向小康过渡的问题。城市则不但远远超出这一层次，其目标也复杂得多。这两个最基本的区别，使我们对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所产生的许多新思想、新观念，究竟在城市适用到何种程度，不能不予以选择。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三十多年来彼此隔绝，各自呈内援型的模式发展，仅靠某种行政措施联结着几条渠道，作为两种社区，其性质的不同，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鲜明的。中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是农民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农村改革一旦启动，按照农民们自己的愿望，说得透彻一点，就是强烈的致富愿望，将会驱使他们一往无前走到底，直至城乡一体化。我们在思考社会变迁的整个进程中，必须对农民的这种“主观愿望”，以及由于这种愿望不由自主地冲向各个经济领域，掀起一阵阵的“高速度”，予以充

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城乡一体化”在中国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艰难所在，任何带有浪漫色彩的思维是无济于事的，在今天更是如此。

最后，从长期的得失比较上看。历史证明，在中国如果不考虑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安定这八亿人口，社会的发展就极为艰难。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如此。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乃至各个方面，都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农民的利益，不仅指眼前的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利益。作为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资金、能源、原材料都相当紧缺的国家，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某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态度，四个现代化是为子孙后代长远着想的。考察经济效益并不只是从产值、利润、财政收入是否同步增长来看，而是要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及未来“机会”的得失比较。还有，在考察经济效益的同时，社会效益也是一个同样权重的砝码。

我们提出上述的种种看法，并不表明我们对农村工业的发展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只是为了说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有着长远影响的问题。判断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正好说明了问题的重要。因此，在农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其方向、结构、速度等各方面如何控制，选择什么顺序策略，与我国整个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四、在社会变迁中对追求自由程度的选择与确定

自由并不是资产阶级独家发明、独家所有的“专利”，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由不仅是一种道义和情感，也不仅仅属于纯粹精神的范畴，自由的本质首先要从人类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来看，它是和劳动，和人类的基本实践紧密相关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策，解放了过去对农民的种种束缚，赋予农民们以劳动的自由，促进了农村经济强有力的发展。而农民们一旦获得了这些自由，几乎是本能地更加执着地追求这种自由。于是新事物层出不穷——多种经营迅速展开；大步跨进工业、商业领域；能人、资金、技术加快了流动和组合；社会化服务体系迅速成长；对开发性经营的巨大热情在很短时间内转变为实践活动；直至离土农民潮水般地涌现……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两点：其一是增强企业活力；其二是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承认企业的自主权，承认职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权利，承认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给各种经济杠杆以自动调节的自由，等等。这一切实质上也就是要实现给工人们以劳动的自由，使工人们真正成为各个生产领域的主人。

同样，我们党在废除干部终身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及各阶层的作用；花大力气抓法制建设，完善各种法规；进一步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正是体现出给广大人民以真正的政治上的自由，逐步完成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几年来，由于党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人民从各个方面的实践中体会到了自由，并且不断追求更广泛的自由，因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给整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从各方面给以有力地推进。

但是，也正因为自由是人类主体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类的自由程度也就不能超越社会实践的内在本质规定。否则必将受到惩罚，在追求自由中走向反面——失

去自由。要求生产高速度发展，似乎是满足了对生产自由的充分追求，但由此造成了宏观经济失控，在采取银根紧缩等种种不得已的措施下，又不得不部分甚至全部失去生产的自由；消费基金膨胀，大家手上都拿了许多钱，似乎可以在市场上更自由地进行消费。但在生产结构很不合理，需要大力调整的情况下，这种靠需求“拉动”生产的结果，造成生产者盲从错误的市场信号，造成更深一轮的低水平上的过度竞争，进一步僵化不合理的生产结构。结果使消费者面对大量的伪、劣质品，只好“持币待购”，更不自由。更不要谈由此造成的其它一系列重要影响了。同样，如果我们只强调微观搞活，似乎是给企业以充分的自由，但一系列必须具备的基础和手段却跟不上去，或“乱”或“死”是必然的结果。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实现高速度，又要完成大幅度的结构变动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无论是在物质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在追求自由的同时，都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和所受到的约束。同样，我们鼓励和允许追求自由的程度，都应该与客观实践的发展相适应。自由总是相对的，总是和必然性相比较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作为社会变迁过程中有计划的大幅度跨进，必须选择适合客观需要的自由程度。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开放一些，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约束；先开放哪些，后开放哪些，合理而又准确地作出选择。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五、关于三条主脉络相互关系的一些思考

在我们对当今影响社会发展的三条主线分别作出了一些描述以后，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在总体上对这三条主线进行一些思考。我们想强调指出的是“两个开放”、“农村工业的发展”、“追求自由的进程”，是当今社会值得密切注意的三个方面，但并不等于说这三条主脉络就可以囊括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可以解释各种现象。

在进行系统的整体思考前，有必要对思考的起点再作点追溯和说明。如前所述，这三条主脉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过去长期受到巨大的压抑；另一个共同特点则是一旦压抑消除，他们的发展速度都是极其惊人的。受压抑的主要原因，粗略地说，起先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后来是主观判断的失误，接着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天灾人祸造成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在这三者互成因果的作用下，采取了封闭型的刚性系统自我循环维持系统运转的不得已的策略。对这三条主脉络的发展予以压抑，恰恰是这个系统赖以运转的主要机制。因此，对于过去的封闭系统来说，这种压抑也是相对合理的。

但是，第一，我们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系统，只是全球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封闭并不能回避或逃脱现实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的发展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的意志再伟大，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终究是有限度的。因此，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本质内容，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可以压抑一时，但无法永久压抑下去。现在的问题是：

首先，当我们改造这个系统时，由于社会系统并不是一个机器系统，可以完全打散，该换的部件就换，按优化原则和所需达到的目的重新组装。社会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生成、革新，我们只能通过重新制定系统运行法则，通过这些机制来控制各个“部件”的行为，逐步完成系统的功能转化。换句话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系统”总是保有“旧系统”的各种成分、部分“部件”和长时期的痕迹。

其次，由于上述“压抑”在旧系统中是合理的，因此被压抑的东西的任何“生长”，对于旧系统来说都是一种“反动”。另一方面，在保有“旧系统”的成分的“新系统”中，曾

经受到压抑的东西的发展当然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抵制。

最后，我们有必要注意被压抑的东西由于长期受到巨大压抑而产生的“变态”。如果在新历史舞台上，其作为角色的地位日益上升，而又缺少对这种“变态”的控制和治疗，新系统就更难生成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前面所述的三条主线在社会变迁中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并由此来判断他们在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同时又指出“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这说明，人类唯有通过对自由的追求才能由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同时在今日的“必然王国”中，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必须符合客观实践的本质。在追求自由中，这种希望与现实、本能的欲望与环境的得来的一切矛盾将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准确、机智、合理地利用和控制这对矛盾，是新系统正常运转的主要机制。关于农村工业的发展，一般来看，似乎不足以提到这么高的层次来看待。我们之所以作如此判断，是基于在有八亿农民的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问题；是如何缩小工农业剪刀差，将曾经被严重扭曲的生产结构重新合理地调整过来的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如何恰当处理这个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新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部件。这个“部件”处理不好，将难以想象整个经济的正常发展。从世界范围来说，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如果说“追求自由”是系统运转的机制，“农村工业发展问题”是系统的关键部件，那么“两个开放”就属于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对“两个开放”成功地控制，我们就能处理好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系统的生成、革新。

概括说来，如果合理地运用机制，使各个部件逐渐形成良好的结构，产生优越的功能，从而使整个系统的输入、输出状态具有良好的行为，与整个环境形成良好的关系，我们就能以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的状态，推进社会有计划变迁的进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主要对上述三个方面发展的方向、顺序、速度的控制合理地把握社会变迁的进程。恩格斯说过：“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变革和变迁历来就有计划因素，问题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因素有多有少、有大有小罢了。在不否定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大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时候，我们想强调一句中国的古话：“欲速则不达”，因为我们应该深刻认识上述三个方面所受的长期压抑，可能对它们的发展发生负作用。如果社会变迁的速度偏快，在原有的社会结构变形过程中，旧的东西被否定、抛弃，新的东西迅速介入，但又并未得到很好的融和，继承性不够理想，那么，更加直感的不平衡状态所造成的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的危险，将会出现。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王 颖